

## 关于更始皇帝刘玄即位的时间问题

曾建华

西汉末年，由于王莽篡权之后，实行了一系列脱离社会现实的政策，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加剧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发展。公元十七年在今湖北境内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绿林农民大起义。起义爆发后得到当地群众的广泛响应，到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等农民起义部队打败王莽官军甄阜、梁丘赐部后，队伍空前壮大，众达十余万。当时绿林军尽管人多势壮，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文号、旌旗、表帜”，为了把反莽斗争推向深入，农民军“诸将会议立刘氏以从人望”，实行统一领导，指挥各部的反莽斗争。于是他们在清水沙滩上拥立了刘氏后裔刘玄为帝，即为更始皇帝。但是史书对更始皇帝刘玄即位时间的记载都不完全一致。如：

《汉书·王莽传(下)》记载：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朱鲂等共立圣公(即刘玄)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

《后汉书·光武帝纪》则记载说：更始元年“二月辛巳立刘玄为天子”。另外《刘玄刘盆子列传》也记载为：“二月辛巳，设坛场于清水上沙中，陈兵大会。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于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

由于《汉书》与《后汉书》记载相差一个月，也导致了现在研究这一历史问题在时间上的差异。

那么刘玄即皇帝位到底是“三月辛巳朔”还是“二月辛巳”?《汉书》与《后汉书》是否必有一错呢?

据陈垣《廿二史朔闰表》，地皇四年三月朔为“辛亥”，不是“辛巳”，而且按三月朔日“辛亥”推算，该月亦无“辛巳”日。另查二月，朔日恰恰是“辛巳”，与《后汉书》的记载合，以此可知《后汉书》的记载不误。那么是可以断言《汉书》所记“三月辛巳”是“二月辛巳”之误呢?

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初始元年十二月王莽“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此可知王莽上台后，改国号并改元，同时又改历法，把汉初始元年“十二月朔癸酉”改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也就是说王莽登台后所用的历法比原来汉朝所用的历法提前了一个月。

但是，当刘玄即位后，是以汉统自居的，于是又废除了王莽的历法，仍使用汉代原来的历法，这就造成了《汉书》与《后汉书》记载上的差异。因此《汉书·王莽传》所载更始皇帝即位时间为“三月辛巳”，并非误记，而是以王莽历记载的缘故。

其实除了刘玄即位时间之外，《汉书》与《后汉书》中记载更始政权建立后至王莽政权灭亡一段时期中的事件，均相差一个月。如：

《汉书·王莽传(下)》	《后汉书》
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朱鲂等共立圣公(刘玄)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	地皇四年“二月辛巳，设坛场于清水上沙中，陈兵大会，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于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刘玄刘盆子列传》 “二月辛巳，立刘圣公为天子”。 《光武帝纪》
“四月，世祖(即光武帝刘秀)与王常等别攻颍川，下昆阳、鄆、定下陵”。	三月，光武与别将徇昆阳、定陵、鄆，皆下之。” 《光武帝纪》
六月，昆阳大战。	五月至六月初，昆阳大战。《光武帝纪》
“十月三日庚戌，商人杜吴杀莽，取其绶。校尉东海公宾就，故行大治礼，见吴问绶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隙间’。就识，斩莽首”。	“九月庚戌，三辅豪桀共诛王莽，传首诣宛”。 《光武帝纪》 “九月东海人公宾就斩王莽于新台，收玺绶，传首诣宛”。 《刘玄刘盆子列传》

这些记载虽然都相差一个月，但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史学家班固、范曄在修史过程中是尊重客观事实的。

根据上述历史事实，关于刘玄即位的时间可以用三种方法记载：

1. 按王莽历记载为：地皇四年三月辛巳。
  2. 按汉朝所使用的夏历记载为：更始元年二月辛巳。
  3. 折算为公历，则为：公元23年3月11日。
- 当然，这三种记载应该说都是正确的。

## 瞿秋白汉字改革的思想与实践

王志方

瞿秋白同志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建设和上，做了大量开拓性、奠基性的工作”，而且对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改革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 方块汉字的改革者

瞿秋白同志认为方块汉字是“艰深”的、“复杂”的、“紊乱”的，与活的语言相脱节的，它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文化的普及，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这些缺点，构成了方块汉字必须改革的理由。

瞿秋白同志在深入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规律和借鉴西洋语言文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汉字改革必须走拉丁化的拼音道路。他说：“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适应从象形文字转到拼音文字的过程。”<sup>①</sup>“中国现代语言发展的情形，已经必需采用拼音制度，必需最彻底的文字革命——就是完完全全废除汉字。只有这样，方才能够超过汉字的一切束缚而进步起来，使中国文字一天天的丰富。无论在文学方面和一切科学方面都能够适应现代的社会生活”<sup>②</sup>。同时，他讲到汉字拼音化的可能性，“这种文字革命的可能。也已经出现，而且逐渐的扩大起来。……而现在正在发展着的“现代中国普通话”——从日常谈话到政治演说，直到深奥的科学演讲，——总之，就是真正口头上的白话，以及根据这种白话而写出来的真正白话文，却已经有采取简便的拼音制度的可能。”<sup>③</sup>他进而认为，中国要改用拼音字母，就应当采用罗马字母（拉丁字母）。他在回顾、分析了当时已经发动了十五年的“注音符号”运动之后说：“而且注音符号的形体仍旧是采取汉字的偏旁，即使完全用这种符号来写拼音的文字，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仍旧和世界先进国家通用的罗马字母不一样。”<sup>④</sup>因此，他再三强调，“现在最适当的办法，是适应着自然发展出来的普通话，制造一种新中国文——用罗马字母拼音的文字，作为全国通用的文字”。<sup>⑤</sup>“中国话的采用拼音制度，采用大多数先进国家所用的罗马字母，已经是完全可能的了。”<sup>⑥</sup>

###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开创者

早在1921年，瞿秋白同志就开始从事汉字拉丁化的研究工作了。这一年，他在莫斯科写出了一份最早的《拉丁化中国字》的草稿。不久，因为回国参加革命工作，这一研究便中断了。

1928年瞿秋白同志再次到苏联，这一年他和吴玉章、肖三、林伯渠等同志一起研究汉字拉丁化问题。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研究，把草案修改了好几次。在1927年他用“СТРАХОБ”的笔名写了中国第一部介绍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著作《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由莫斯科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КУТК）用玻璃版印刷发行。1929年10月10日，瞿秋白写成了《中国拉丁化字母》的小册子，1930年由莫斯科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КУТК）出版，署名“瞿维托”。这个方案与第一个方案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他放弃了标调的方法，认为在实用的拼音文字中标调是不必要的和不适宜的。1930年夏天，瞿秋白同志回国参加革

①②③《瞿秋白文集》第646、658、705页。

④⑤⑥《瞿秋白文集》第662、661、686页。